

成事在先——三国刘馥的先手棋

崔庆

饱带饥粮,晴带雨伞,老百姓过日子都讲究“留一手”,军国大事更要有风险意识,三国时代的刘馥就是这样的“识途老马”。

刘馥字元颖,沛国相县(今安徽濉溪)人,目光敏锐,善观大势,行动果决。建安初年(196年),刘馥看清袁术无能昏暗,便劝说袁术部将,一同率领人马投奔曹操,并受到赏识,成为其幕府谋士。建安五年(200年),曹操和袁绍正在官渡对峙,处于胶着状态。北方大事未定,南方局势已乱,孙策所部袭扰,扬州刺史严象殁于乱军之中,长江中下游以南、以东的扬州辖境,大多被孙策孙权占有,地方豪强并起。如果角逐天下,曹操必然要和孙氏势力争夺江淮地区,经略合肥、重新建置扬州是关键一步。情势危急之下尤需开局破局,曹操认为刘馥“可任以东南之事”,任命其为扬州刺史,期望能够迅速稳定后方。

刘馥本为一介文臣,临危受命却豪气满怀、浑身是胆,只身匹马进入扬州的合肥城,迅速开出了应对“药方”。一是建立州治。落实曹操的战略设想,以合肥为中心,重新建置扬州,建设抗衡孙氏势力的前线基地,用怀柔方式化解雷绪

等人的地方叛乱,迅速稳定了江淮地带的局势。二是安顿百姓。百姓乐附,远人来归,“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”,劳动力得到了极大补充,改变了原先合肥“空城”的窘境。既来之,能安之,刘馥还兴办教育、推广屯田,“数年中恩化大行”,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。三是兴修水利。古时水利为国计民生之本,刘馥组织修建、整治芍陂、茹陂、七门、吴塘等水利设施,疏筑并举、方便灌溉,百姓受惠,同时奖励农业开垦和耕种,促进社会经济迅速恢复。四是整军备战。刘馥就任扬州同年,孙策遇袭身亡,这对于曹操阵营看似是重大利好,但刘馥丝毫没有松懈,深刻认识合肥城地理位置的战略意义,利用一切条件加紧备战,全面做好与孙氏势力硬怼的准备。

北方战局吃紧,刘馥单身空手入合肥,不可能指望有任何后援,只能就地挖潜、自力更生。人气聚拢了,就会有办法。合肥地处南北要冲,在当时乱世之中,决不能有任何侥幸,自强才能自卫,必须要有打大战、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基础,加固城防尤为重要。史称刘馥“高为城垒”,意在把合肥打造成前线坚城,适合在己方势弱的情况下打持久防御战。此外,刘馥储备大量木石、草苫、鱼膏,以为

“三宝”,作为战略物资。木石可以做成滚木礮石,是传统的防守武器;草苫可以挡雨、铺路,应付天气突变;鱼膏易于储存,经久不变,可以照明、燃烧,情急时候也可以充饥。这三样物品的制作原料普通,木石取自山林,草料来自荒野,水乡盛产鱼虾,鱼膏的价格远低于灯油,但用途更加广泛。几乎不需要额外经费,合肥城的备战物资就充盈府库了,达到“草苫数千万枚”“鱼膏数千斛”,有了抗击大敌来袭的底气。

建安十三年(208年),刘馥在扬州刺史任上去世。就在同年,曹魏主力深陷赤壁前线,孙权亲自领军围攻合肥,试图乘势一鼓而下。然而此一时彼一时,合肥经过刘馥近十年经营治理,已经脱胎换骨。孤城虽危,但人心安定、从容应对,草苫雨中护城,鱼膏夜中照明,滚木礮石防御,百日苦战安然无事。此后孙权数次攻伐合肥,都是无功而返。尤其在建安十九年(214年),孙权第二次领主力大军前来,却被张辽以少胜多,甚至几乎丧道遥津。合肥固若金汤,扬州民众更加敬佩刘馥先见之明,认为其功绩甚至胜过春秋时代修建晋阳城、救赵氏于危难的董安于。

备豫不虞,为国常道,能者深得其要。十年生聚、十年教训,十

年治理、十年备战,刘馥从“救火队长”到善治良牧,走一看三观五,综合治理和聚焦备战长短结合,合肥成为遏制孙氏势力北上的关键棋子。刘馥从未和孙权交手,却成其噩梦,扬州官民长久感念他的功德,他所组织修建的陂塘水利一直也为后世沿用。

(转自《学习时报》)



立身贵廉明

陈白云 章涛

一生廉慎为官的石璞,正如他的名字一样,看起来质朴无华,其实蕴藏着“廉而不刿,鲜而不垢”的美玉品质。何为“廉而不刿”,廉的本意是厅堂的边,引申为边棱、棱角,玉有棱角,但不会割伤他人。何为“鲜而不垢”,玉色泽光鲜,不能轻易污染。君子比德于玉,管子曾归纳了九种玉德,“廉而不刿,鲜而不垢”是其中两种。

石璞自幼聪慧,过目成诵,且有大志,苦读诗书,富贵、贫贱无一动其心。明永乐九年(1411),石璞考中举人,得以进入明代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,后表现出色,“选授御史”。

正统(明英宗年号,1436—1449)初,石璞任江西按察使,以“善断疑狱”而获得百姓的称赞。《明史》记录了他在任上断的一桩案子:一民女初嫁三日,

回娘家归宁时失踪。其父告到官府,指控女儿被女婿所害。新郎无法自证清白,只好服罪,按例当处极刑。石璞阅案后,觉得其中有疑。次日,他令人假意押送罪犯去刑场,人马尚未从公堂出发,他发觉有一童子从门缝中偷看。石璞审问童子,原来他是受人指使前来。石璞由此查明,指使童子前来的人正是隐藏民女的罪犯,最终真正的罪犯得到严惩。石璞任职江西数年,整肃纲纪,社会安宁,风气为之一清,即使是妇女儿童也知道他的美名。

石璞爱民如爱子,治邑如治家。正统七年(1442),石璞出任山西布政使。到任后,他发现地方官吏在征收“朝廷岁用物料”时,常多摊派多征收,加重民众负担。于是,他向朝廷奏请,减轻百姓负担,获得采纳。

石璞家风端正,正气充盈。有一次,石璞八十高龄的母亲到家附近活

动,石璞下属立即叫来官轿,让老夫人坐。老夫人正色道:“我在家平素清俭,步行可以当车!”不受而去,令僚属皆敬服。有一次,石璞的夫人应邀出席一个官员内眷的宴会,宴罢回来,夫人满脸不悦。石璞问起缘故,夫人说:“她们都穿金戴银,而我荆钗布裙,真让人难为情啊。”石璞不以为然,故意问道:“那你坐在什么位置呢?”夫人答道:“我坐在第一。”石璞笑着开导:“正是因为你穿朴素之衣,才能坐第一。”言罢,神情转为严肃:“我做官不是为了让你穿上锦衣华服,也不是为了炫耀攀比,其他人虽然穿着华贵,但恐怕永远也坐不到第一。”石璞一席话,让夫人脸红了起来。从此,石璞的夫人甘愿与他清约省素,简朴度日。第二年,那些穿着华贵的官夫人中,果然有人的丈夫因为贪污而被罢官。

朱祁钰继位后,石璞受命于危难

之际,治理决口的黄河。此时的石璞,虽两鬓斑白,但他为治水殚精竭虑、夙兴夜寐。他时常布袍草履,冒雨冲风,往来于各个工地之间。他从改革漕运入手,以疏堵结合的办法降服水患。后石璞改任兵部尚书,和于谦一起协理兵部的政事。天顺元年(1457),石璞致仕。

英宗朱祁镇复位后,有一天问大臣李贤:“石璞是正直之臣,我听说他还健在,过得很艰苦,你替我将他召来吧。”石璞来京后,被请到文华殿陛见。尽管石璞年事已高,英宗依然任命他为南京左都御史,以示嘉奖之意。

石璞晚年连一间宅第都没有,勉强盖起三间茅屋,仅靠一亩菜地度日,生活十分清苦。这时,有个在外任县尉的亲戚落职还乡,宴请石璞。石璞来到他家,见桌上摆放着豪华的银盃金杯,心中极为不快。石璞问道:“你做了几年的官?”县尉答:“没满一考。”石璞暗暗思忖,不足三年就有如此“收获”,必然节操有亏。“为什么不做官啦?”石璞又问。“唉!有人诬告我贪污,被夺了职。”县尉恬不知耻地讲道。石璞听罢,厉声说道:“要是你做我的手下,你还能安然回乡?”说完,拂袖而去。

“临官莫如平,临财莫如廉。廉平之守,不可攻也。”石璞不改廉节,其“从官重公慎,立身贵廉明”的形象让人肃然起敬。

(转自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)

